

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的显著成效及有效路径

——基于2012年12月至2025年7月数据的量化分析

孙大伟 樊嘉浚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北京 100732)

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党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取得显著成效。为全面系统认识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的查处情况,本研究基于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向社会公开发布的《各省区市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汇总表》,构建了2012年12月至2025年7月的长时间段连贯数据库,对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查处情况进行统计学意义上的量化分析,揭示了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的产生、发展和变化规律。在此基础上,提出坚持问题导向,探索靶向纠治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的有效路径。

关键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全面从严治党

中图分类号:G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291(2025)06-0073-12

DOI:10.16197/j.cnki.lnupse.2025.06.008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综述

在中央八项规定制定实施13周年之际,按照党中央的统一要求,自2025年全国两会后至7月底,全党上下启动新一轮关于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此次专题学习教育的核心任务在于深入领会与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以及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的具体要求;对党的十八大以来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实践成果与宝贵经验进行系统性回顾;同时还着重要求集中整治违反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的突出问题,运用由风及腐案例加强警示教育,并就如何查摆问题作出明确指示。为此,我们有必要将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的情况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问题导向,靶向纠治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

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关于中央八项规定的学术研究成果并不多,而且主要集中于中央八项规定的重要性、可行性和有效性的理论阐释方面。一是关于中央八项规定重要性的研究。赵修义认为,中央八项规定的实施既是防止国家权力异化的需要,也是巩固人民政权性质的必然要求,又是破解历史性难题的探索。^①王锐、倪星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面临着“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全面从严治党既是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②曲洪波认为,中央八项规定不仅是一项政策,更是党在砥砺奋进中推进廉洁实践、建立廉洁制度、形成廉洁理论的历史自觉的体现,彰显了党与腐败

收稿日期:2025-08-12 **收稿日期:**2025-10-14

作者信息:孙大伟,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从事纪检监察学、中共党史党建学研究。

樊嘉浚,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社会与民族学院硕士研究生,从事政治社会学、廉政学研究。

基金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创新项目“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研究”(2023YZD014)。

① 赵修义:《从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角度来看待作风问题》,《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3年第11期。

② 王锐、倪星:《作风建设、政党纪律与党的自我革命——基于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执行情况的理论思考》,《政治学研究》2024年第3期。

水火不容的根本立场。^①二是关于中央八项规定可行性的研究。李斌雄、兰洁和赵庆寺认为,中央八项规定的可行性根植于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和建设时期形成的管党治党的历史传统和独特优势。^{②③}赵修义则将中央八项规定的可行性追溯至巴黎公社和俄国社会主义建设关于防止权力异化的经验。^④孙大伟认为,中央八项规定聚焦群众身边的作风问题,从小切口入手,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⑤赵庆寺等指出,中央政治局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以自身的实际行动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引领了全国范围内作风建设的深刻变革,形成了自上而下的示范效应,为中央八项规定的实施注入了强大动力,也提供了坚实的可行性保障。^{⑥⑦⑧}余森杰、王喜满认为,中国反腐败斗争立足自身实践,着力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的体制机制,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反腐道路,这为中央八项规定的长期有效实施提供了根本性的制度保障。^⑨三是关于中央八项规定有效性的研究。在政治生态层面,学者指出中央八项规定的实行有效降低了行政成本,^⑩提升了基层治理效能,^⑪使得党员干部作风显著转变,^{⑫⑬}营造了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⑭⑮}促进权力运行规范化和透明化。在经济发展层面,王明杰认为,中央八项规定的实施减少了公务消费对市场的不良影响,促使产品价格回归正常,供需关系更加健康,对多个行业的健康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⑯在社会效应层面,王锐、倪星指出,中央八项规定赢得了人民群众的广泛认可和支持。^⑰G. Ang等人的研究发现,中央八项规定的实施,减弱了干部家庭背景对公务员系统进入机会的影响,进而促进了社会公平。^⑱通过改进干部作风,社会风气得到进一步好转,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和支持度显著提升。同时,中央八项规定的实施也拓展了群众参与监督渠道,^⑲有效提升了群众满意度,^⑳营造了更加和谐密切的党群关系。^㉑

相较于理论阐释研究,通过收集和分析数据对中央八项规定进行统计学意义上的量化研究,具有直观

① 曲洪波:《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构建的历史自觉探索》,《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5期。

② 李斌雄、兰洁:《基于中共“八项规定”的纠风机制与腐败治理机制创新探究》,《河南社会科学》2016年第10期。

③ 赵庆寺:《中央八项规定:全面从严治党的方法论意蕴》,《江淮论坛》2017年第4期。

④ 赵修义:《从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角度来看待作风问题》,《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3年第11期。

⑤ 孙大伟:《中国共产党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改革创新及经验启示》,《社会科学辑刊》2024年第6期。

⑥ 王锐、倪星:《作风建设、政党纪律与党的自我革命——基于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执行情况的理论思考》,《政治学研究》2024年第3期。

⑦ 赵庆寺:《中央八项规定:全面从严治党的方法论意蕴》,《江淮论坛》2017年第4期。

⑧ 苏胜利、杨明:《新时代作风建设的实践创新与规律把握》,《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22年第6期。

⑨ 余森杰、王喜满:《坚持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反腐败道路》,《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5期。

⑩ 王明杰:《“八项规定”带来的巨大改变》,《人民论坛》2017年第1期。

⑪ 韩强:《中央“八项规定”有效实施对全面从严治党的经验借鉴》,《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5年第6期。

⑫ 苏胜利、杨明:《新时代作风建设的实践创新与规律把握》,《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22年第6期。

⑬ Y. Guo, and S. Li, “Anti-Corruption Measures in China: Suggestions for Reforms,” *Asian Education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vol. 4, no. 1(2015), pp. 7-23.

⑭ 席代凡:《中央八项规定为什么行?》,《红旗文稿》2019年第16期。

⑮ S. Zhang, and D. Mcghee, “China’s Ethical Revolution and Regaining Legitimacy: Reforming the Communist Party Through its Public Servants,” *Springer*, 2017, p. 6.

⑯ 王明杰:《“八项规定”带来的巨大改变》,《人民论坛》2017年第1期。

⑰ 王锐、倪星:《作风建设、政党纪律与党的自我革命——基于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执行情况的理论思考》,《政治学研究》2024年第3期。

⑱ G. Ang, et al., “From Connections to Merit: Anti-Corruption Reform and Occupational Mobility in China’s Civil Service,” *The Economic Journal*, vol. 135, no.670, 2025, pp.1852-1890.

⑲ 吴楠:《中央八项规定的政治学解读》,《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

⑳ 苏胜利、杨明:《新时代作风建设的实践创新与规律把握》,《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22年第6期。

㉑ 席代凡:《中央八项规定为什么行?》,《红旗文稿》2019年第16期。

性、客观性和可比性等优势。然而,目前学术界以量化方式研究中央八项规定的成果更少,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类是采用变量思维,将中央八项规定作为外生变量,探究其对消费、^{①②③}公司绩效、^{④⑤⑥⑦}公务员思想状况^⑧等因素的影响;第二类是对中央八项规定数据本身的研究,比如汪波通过构建2015—2016年中央八项规定的小型数据库,从历时性走势、类型分布、行政级别分布三个维度分析中央八项规定的效果和趋势,开创了对中央八项规定进行量化研究的先河。^⑨之后,代凯基于2013—2018年的数据,^⑩陈明玉、崔建国基于2013—2022年的数据,^⑪扩展了中央八项规定量化研究的时间范围。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相关数据的持续更新,体现出我们党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不断推进作风建设的坚定决心。本研究基于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公布的数据,持续追踪数据动态,构建了2012年12月至2025年7月的长时间段连贯数据库,旨在通过对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查处情况进行统计学意义上的量化分析,揭示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的产生、发展和变化规律,并在此基础上,坚持问题导向,探索靶向纠治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的有效路径。

二、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查处情况的历时分析

为及时掌握各地区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情况,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建立了月报制度。2013年11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了第一期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的月度通报数据,即《2013年9月各省区市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汇总表》,由此开启了向社会披露此类问题查处进展的官方渠道。该汇总表分别从内容、项目、数量、类型等四个层面公布相关统计数据。第一,关于内容的数据分为两类:一是2013年9月份各省区市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情况,即月度数据;二是中央八项规定实施以来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情况,即整体数据。第二,关于项目的数据分为三类:一是查处问题数;二是处理人数;三是给予党纪政务处分人数。其中,“查处问题数”指的是在执纪监督过程中,经查证属实的、与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相违背的事件总数;“处理人数”指的是因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被采取非纪律处分措施的人员数量;“给予党纪政务处分人数”指的是因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而受到党纪处分或政务处分的人员数量。第三,所谓数量的数据分为四类:一是查处地厅级领导干部数量;二是查处县处

① 梅洁:《国有控股公司管理层报酬的政策干预效果评估——基于“限薪令”和“八项规定”政策干预的拟自然实验》,《证券市场导报》2015年第12期。

② 梅洁、葛扬:《国有企业管理层在职消费的政策干预效果研究——基于2012年“八项规定”出台所构建的拟自然实验》,《经济学家》2016年第2期。

③ 杨蓉:《“八项规定”、高管控制权和在职消费》,《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

④ 王霞、王竞达:《“八项规定”对酒类上市公司财务绩效的影响研究》,《经济与管理研究》2015年第1期。

⑤ 颜恩点:《寻租、制度变革与公司价值——基于“八项规定六项禁令”的实证检验》,《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6年第5期。

⑥ X. Jin, Z. Chen, and D. Luo, “Anti-Corruption, Political Connections and Corporate Responses: Evidence from Chinese Lsted Companies,” *Pacific-Basin Finance Journal*, vol. 57, 2019, pp.1-20.

⑦ Y. Hu, and M. Xu, “China’s Anti-Corruption Campaign, Political Connections and Private fFirms’ Debt Financing,” *China Finance Review International*, vol. 9, no. 4, (2019), pp. 521-553.

⑧ 黄杰、王培智:《“八项规定”后江苏基层公务员思想状况调查》,《学海》2015年第6期。

⑨ 汪波:《八项规定的实效测评与制度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6年第5期。

⑩ 代凯:《中央八项规定实施六周年:成绩与展望——基于对2013—2018年数据的统计分析》,《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9年第3期。

⑪ 陈明玉、崔建国:《全国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统计数据中的变与不变——基于十年(2013—2022)数据分析》,《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学报》2024年第1期。

级领导干部数量;三是查处乡科级领导干部数量;四是以上数量的总计。第四,关于类型的的数据分为七类:一是楼堂馆所违规问题;二是公款大吃大喝问题;三是违反公务用车管理使用有关规定问题;四是公款旅游问题(国内);五是公款出境旅游问题;六是大操大办婚丧喜庆问题;七是其他问题。

随着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不断完善,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布数据在项目、数量、类型上的名称与统计口径也随之调整。就项目而言,对于“处理人数”这项数据进行了三次调整:自中央八项规定实施至2020年10月期间的项目数据公布的是“处理人数”,2020年11月至2023年10月期间,调整为“批评教育帮助和处理人数”,2023年11月至今,进一步调整为“批评教育和处理人数”。对于“给予党政纪处分人数”这项数据也进行了三次调整:从中央八项规定开始实施至2017年12月期间公布的是“给予党政纪处分人数”;2018年1月至2019年11月,改为“给予党纪政务处分人数”;2019年12月至今,改为“党纪政务处分人数”。

就数量而言,自2024年1月起将“数量”这一名称调整为“级别”;中央八项规定实施至2017年12月期间公布的是“乡科级”的数据;2018年1月至今调整为“乡科级及以下”的数据。

就类型而言,在2014年1月、2015年1月和2019年12月进行了三次结构性的调整,最终确定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与“享乐主义、奢靡之风”两大类数据。

(一)从总体视角分析查处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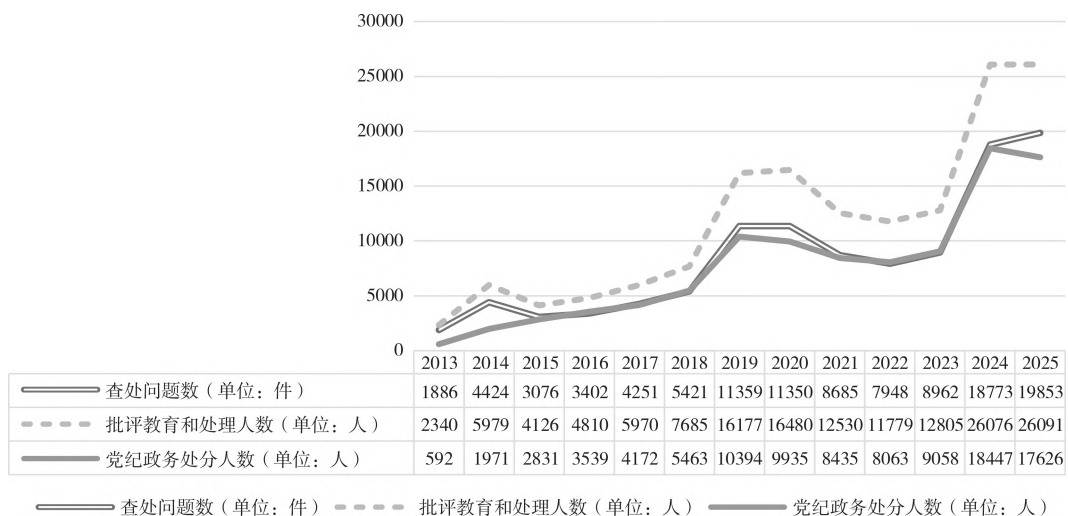


图1 历年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查处情况统计图(月平均数)

由于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于2025年7月结束,为保证数据的时效性与完整性,本研究的数据统计分析同样截至该时间点。为了使数据具备可比性,确保统计分析的科学性,本研究将中央八项规定实施以来历年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计算出月平均值,并做出折线图。其中,2025年的数据为1至7月的平均值。另外,由于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没有单独公布2012年12月的相关数据,而是在公布2013年整体数据时包括了2012年12月的数据,因此,本研究将2012年12月的数据并入2013年进行统一考量,2013年的数据为2012年12月至2013年12月的平均值。

如图1所示,就总体情况看,无论是“查处问题数”“批评教育和处理人数”,还是“党纪政务处分人数”,其绝对数量均呈现出明显的增长态势。从历年走势看,三项数据均呈现出显著的阶段性特征。其中,“查处问题数”与“党纪政务处分人数”在2019年达到首个峰值,而“批评教育和处理人数”则在2020年达到最高点。在经历约四年的平稳回落后,“党纪政务处分人数”在2024年达到高点,“查处问题数”和“批评教育和处理人数”则在2025年达到高点。

通过对比涨幅可以发现,“查处问题数”由2013年(包括2012年12月)月平均1886件上升至2025年的

19853件,涨幅为952.65%;“批评教育和处理人数”由2013年(包括2012年12月)月平均2340人上升至26091人,涨幅为1015%;“党纪政务处分人数”由2013年(包括2012年12月)月平均592人上升至2025年的17626人,涨幅为2877.36%。可见,三个项目均有较大涨幅,其中“党纪政务处分人数”增长幅度最为显著。

(二)从项目视角分析查处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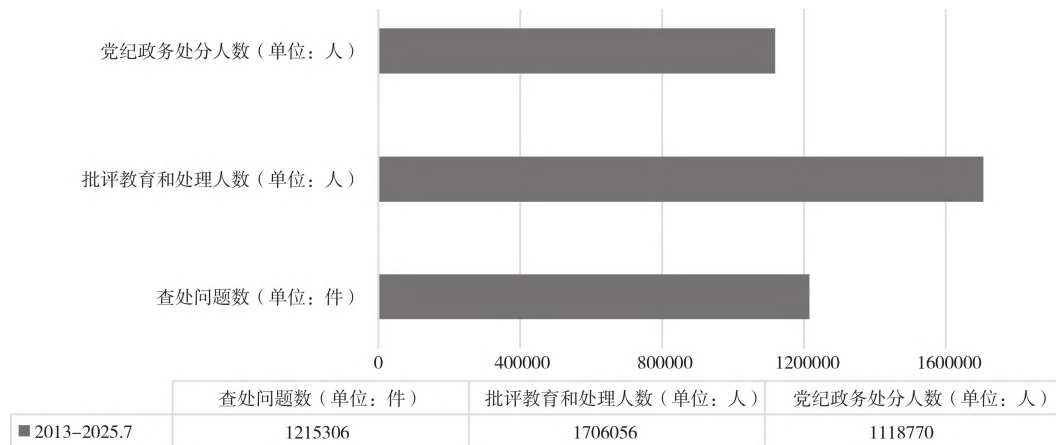


图2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各项目查处情况(总数)

如图2所示,就项目情况来看,中央八项规定实施至今,“查处问题数”总计为1215306件,平均每天263件;“批评教育和处理人数”总计有1706056人,平均每天369人;“党纪政务处分人数”总计有1118770人,平均每天242人。

“查处问题数”“批评教育和处理人数”以及“党纪政务处分人数”三个项目之间存在较强的关联关系。通过计算“批评教育和处理人数”占“查处问题数”的比例可以发现,平均每查处1个问题,就会批评教育和处理1.4人,说明查处的问题涉及多个关联人员。而通过计算“党纪政务处分人数”占“批评教育和处理人数”的比例可以发现,这一比例高达65.6%,意味着每查处100人,约有66人会受到党纪政务处分。

(三)从级别视角分析查处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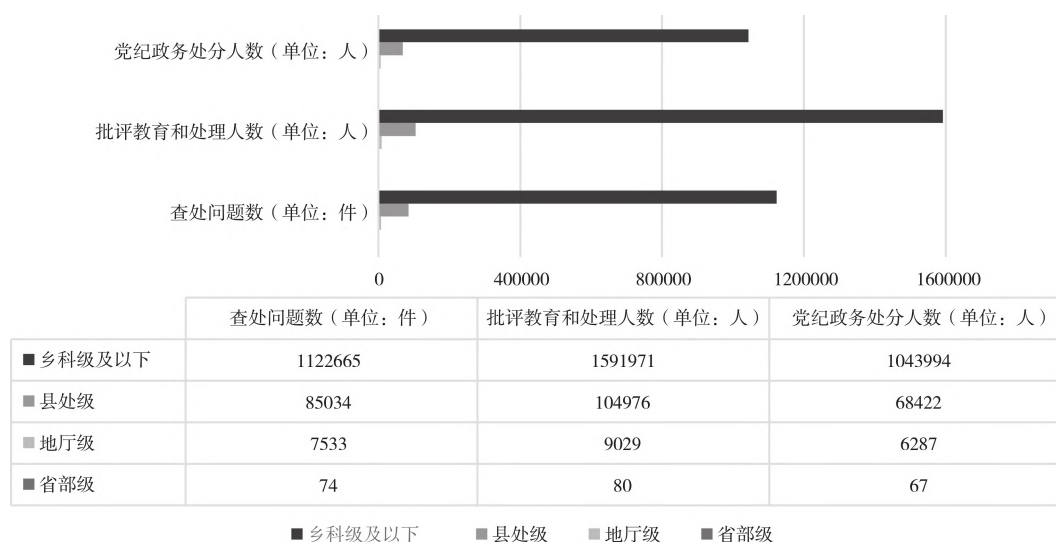


图3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各级别查处情况(总数)

如图3所示,就级别情况来看,乡科级及以下干部的“查处问题数”“批评教育和处理人数”,以及“党纪

政务处分人数”均显著高于其他级别,分别达到1122665件、1591971人和1043994人。通过计算乡科级及以下干部的“批评教育和处理人数”占“查处问题数”的比例可以发现,平均每查处1个问题,就会批评教育和处理1.42人,高于整体平均水平的1.4人。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查处情况因级别不同而存在差异。随着干部级别的提高,相关数据呈明显下降趋势,例如县处级、地厅级和省部级的查处问题数分别为85034件、7533件和74件,但高层干部一旦出现违纪问题,往往受到更为严厉的处分,如省部级干部党纪政务处分比例高达83.8%,远高于65.6%的平均比例。

三、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查处情况的类型分析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类型的统计是一个动态优化的过程。总体来说,可以将2019年作为节点,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中央八项规定实施至2018年12月;第二阶段为2019年1月至今。

在第一阶段,查处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的类型分为“违规公款吃喝”“公款国内旅游”“公款出境旅游”“违规配备使用公务用车”“楼堂馆所违规问题”“违规发放津补贴或福利”“违规收送礼品礼金”“大办婚丧喜庆”“违反工作纪律”和“其他”共10类。

进入第二阶段后,相关问题的类型划分得以优化,主要围绕“四风”问题的两大表现形式展开,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与享乐主义、奢靡之风问题。第二阶段最大的变化在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得以单独公布。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从公布2019年12月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汇总情况开始,首次向社会公开发布查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的数据,具体包括:“贯彻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或者表态多调门高、行动少落实差,脱离实际、脱离群众,造成严重后果”;“在履职尽责、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方面不担当、不作为、乱作为、假作为,严重影响高质量发展”;“在联系服务群众中消极应付、冷硬横推、效率低下,损害群众利益,群众反映强烈”;“文山会海反弹回潮,文风会风不实不正,督查检查考核过多过频、过度留痕,给基层造成沉重负担”以及“其他”等,共5小类。

同时,对查处的享乐主义、奢靡之风问题的类型进行了优化调整。2019年以后的问题类型调整为“违规收送名贵特产和礼品礼金”“违规吃喝”“违规操办婚丧喜庆”“违规发放津补贴或福利”“公款旅游以及违规接受管理和服务对象等旅游活动安排”“其他”等6小类。其中“违规收送名贵特产和礼品礼金”又包括“违规收送名贵特产类礼品”和“违规收送礼金和其他礼品”2小项;“违规吃喝”包括“违规公款吃喝”和“违规接受管理和服务对象等宴请”2小项。

(一)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类型问题查处情况

表1 2019年至今查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情况统计表(月平均数)

年份	项目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			
		贯彻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或者表态多调门高、行动少落实差,脱离实际、脱离群众,造成严重后果	在履职尽责、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方面不担当、不作为、乱作为、假作为,严重影响高质量发展	在联系服务群众中消极应付、冷硬横推、效率低下,损害群众利益,群众反映强烈	文山会海反弹回潮,文风会风不实不正,督查检查考核过多过频、过度留痕,给基层造成沉重负担
2019	查处问题数	175	4966	263	141
2020		267	5015	281	55
2021		120	3417	249	31
2022		104	3131	219	17

续表1

年份	项目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			
		贯彻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或者表态多调门高、行动少落实差,脱离实际、脱离群众,造成严重后果	在履职尽责、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方面不担当、不作为、乱作为、假作为,严重影响高质量发展	在联系服务群众中消极应付、冷硬横推、效率低下,损害群众利益,群众反映强烈	文山会海反弹回潮,文风会风不实不正,督查检查考核过多过频、过度留痕,给基层造成沉重负担
2023	查处问题数	61	3315	234	26
2024		89	7819	576	48
2025		92	8578	756	40
2019		255	7141	384	230
2020		416	7543	405	87
2021	批评教育和处理人数	186	5289	353	44
2022		177	5013	311	27
2023		101	5173	308	36
2024		133	11487	724	75
2025		120	11635	914	58
2019	党纪政务处分人数	127	4411	197	42
2020		199	4211	195	22
2021		117	3370	214	14
2022		118	3219	177	9
2023		73	3423	194	13
2024	97	7636	438	19	
2025	82	7199	578	11	

注：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布的2019年12月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汇总情况，除了包括2019年12月的月度数据，还包括2019年年度数据。

如表1所示，“贯彻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或者表态多调门高、行动少落实差，脱离实际、脱离群众，造成严重后果”问题呈现下降趋势，其中“查处问题数”“批评教育和处理人数”和“党纪政务处分人数”由2019年的月平均175件、255人和127人，下降至2025年的月平均92件、120人和82人，降幅分别为47.43%、52.94%和35.43%。

“在履职尽责、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方面不担当、不作为、乱作为、假作为，严重影响高质量发展”问题呈现上升趋势，其“查处问题数”“批评教育和处理人数”和“党纪政务处分人数”由2019年的月平均4966件、7141人和4411人，上升至2025年的月平均8578件、11635人和7199人，涨幅分别为72.73%、62.93%和63.21%。

“在联系服务群众中消极应付、冷硬横推、效率低下，损害群众利益，群众反映强烈”问题呈现上升趋势，其中“查处问题数”“批评教育和处理人数”和“党纪政务处分人数”由2019年的月平均263件、384人和197人，上升至2025年的月平均756件、914人和578人，涨幅分别为187.45%、138.02%和193.40%。

“文山会海反弹回潮，文风会风不实不正，督查检查考核过多过频、过度留痕，给基层造成沉重负担”问题呈现下降趋势，其“查处问题数”“批评教育和处理人数”和“党纪政务处分人数”由2019年的月平均141件、230人和42人，下降至2025年的月平均40件、58人和11人，降幅分别为71.63%、74.78%和73.81%。

可以发现,无论是从“查处问题数”,还是“批评教育和处理人数”,或者“党纪政务处分人数”上看,“在履职尽责、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方面不担当、不作为、乱作为、假作为,严重影响高质量发展”问题居高不下,一直都是最突出问题;而“贯彻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或者表态多调门高、行动少落实差,脱离实际、脱离群众,造成严重后果”和“文山会海反弹回潮,文风会风不实不正,督查检查考核过多过频、过度留痕,给基层造成沉重负担”两个问题已经得到有效遏制。

(二)享乐主义与奢靡之风类型问题查处情况

表2 查处享乐主义、奢靡之风问题的情况

年份	项目	享乐主义、奢靡之风问题						
		违规收送名贵特产和礼品礼金		违规吃喝		违规操办婚丧喜庆	违规发放津补贴或福利	公款旅游以及违规接受管理和服务对象等旅游活动安排
		违规收送名贵特产类礼品	违规收送礼金和其他礼品	违规公款吃喝	违规接受管理和服务对象等宴请			
2019	查处问题数	156	1092	747	251	382	1281	235
2020		62	1312	615	301	292	1196	241
2021		62	1476	531	336	255	943	211
2022		40	1587	507	379	224	779	155
2023		46	2119	590	633	238	785	166
2024		86	4752	997	1239	308	1469	292
2025		92	5132	803	1371	248	1252	276
2019	批评教育和处理人数	178	1372	1137	441	421	2006	383
2020		71	1617	907	488	334	1921	384
2021		72	1755	789	531	279	1486	336
2022		45	1910	775	602	244	1257	264
2023		52	2435	885	996	260	1264	265
2024		92	5405	1569	1862	347	2449	445
2025		102	5632	1231	2026	322	2007	426
2019	党纪政务处分人数	147	1064	834	291	332	1376	278
2020		56	1254	645	339	247	1297	275
2021		54	1371	588	360	220	1039	251
2022		36	1505	564	419	192	938	194
2023		40	1952	650	734	207	913	209
2024		77	4406	1120	1322	271	1801	344
2025		82	4579	850	1401	219	1389	299

注: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布的2019年12月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汇总情况,除了包括2019年12月的月度数据,还包括2019年年度数据。

如表2所示,在“违规收送名贵特产和礼品礼金”这一大类问题中,“违规收送名贵特产类礼品”问题呈现下降趋势,其“查处问题数”“批评教育和处理人数”和“党纪政务处分人数”由2019年的月平均156件、178人和147人,下降至2025年的月平均92件、102人和82人,降幅分别为41.03%、42.70%和44.22%;“违规收送礼金和其他礼品”问题则呈现上升趋势,其“查处问题数”“批评教育和处理人数”和“党纪政务处分人数”由2019年的月平均1092件、1372人和1064人,上升至2025年的月平均5132件、5632人和4579人,涨幅分别为369.96%、310.50%和330.36%。

在“违规吃喝”这一大类问题中，“违规公款吃喝”问题呈现上升趋势，其“查处问题数”“批评教育和处理人数”和“党纪政务处分人数”由2019年的月平均747件、1137人和834人，上升至2025年的月平均803件、1231人和850人，涨幅分别为7.50%、8.27%和1.92%；“违规接受管理和服务对象等宴请”问题则呈现上升趋势，其“查处问题数”“批评教育和处理人数”和“党纪政务处分人数”由2019年的月平均251件、441人和291人上升至2025年的月平均1371件、2026人和1401人，涨幅分别为446.22%、359.41%和381.44%；“违规操办婚丧喜庆”问题呈现下降趋势，其“查处问题数”“批评教育和处理人数”和“党纪政务处分人数”由2019年的月平均382件、421人和332人，下降至2025年的月平均248件、322人和219人，降幅分别为35.08%、23.52%和34.04%。

“违规发放津补贴或福利”问题的“查处问题数”“批评教育和处理人数”和“党纪政务处分人数”，由2019年的月平均1281件、2006人和1376人，变化至2025年的月平均1252件、2007人和1389人，“查处问题”数降幅为2.26%，而“批评教育和处理人数”与“党纪政务处分人数”的涨幅则分别为0.05%和0.94%。

“公款旅游以及违规接受管理和服务对象等旅游活动安排”问题呈现上升趋势，其“查处问题数”“批评教育和处理人数”和“党纪政务处分人数”由2019年的月平均235件、383人和278人，上升至2025年的月平均276件、426人和299人，涨幅分别为17.45%、11.23%和7.55%。

可以发现，“违规操办婚丧喜庆”和“违规收送名贵特产类礼品”两类问题得到了有效遏制；而“违规收送礼金和其他礼品”“违规公款吃喝”“违规接受管理和服务对象等宴请”“违规发放津补贴或福利”“公款旅游以及违规接受管理和服务对象等旅游活动安排”五类问题，尚未得到根本性遏制，高发态势依然存在。

（三）其他类型问题查处情况

自中央八项规定实施以来，“其他”类型问题的具体内容也在动态调整。在2013—2014年，“其他”类型问题主要涉及公款私用、工作态度散漫等方面；在2015—2017年，“其他”类型问题的内涵则有所扩大，增加了对公务接待标准、私人场所出入以及住房领域违规行为的关注；在2018年，则新增了“违规接受不当宴请”这一问题；在2019—2025年，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其他”类型问题并未做详细说明，而享乐主义、奢靡之风中的“其他”类型问题进一步扩展，包括违规配备和使用公车、楼堂馆所问题、组织或参加用公款支付的高消费娱乐健身等活动、接受或提供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健身娱乐等活动。这表明随着政策的推进和执行，对公职人员行为规范的要求更加全面和严格，涵盖了公车使用、办公场所建设、公款消费以及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各类活动，旨在从多个维度约束公职人员的行为，防止公共资源的浪费和权力的滥用。

总体来看，“其他”含义的变化反映了对公职人员行为规范和廉洁要求的不断提高，监管重点从最初的公款私用、工作态度，逐步扩展到公务接待、私人场所出入、住房、公车使用、办公场所建设以及各类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活动等多个方面，体现了对违规行为界定的精细化和全面性。

表3 其他类型问题查处情况

年份	项目	享乐主义、奢靡之风问题
		其他
2019	查处问题数	972
2020		773
2021		666
2022		548
2023		570
2024		696
2025		663
2019		批评教育和处理人数
2020	959	

续表 3

年份	项目	享乐主义、奢靡之风问题
		其他
2021		830
2022		714
2023	批评教育和处理人数	750
2024		897
2025		886
2019		793
2020		605
2021		542
2022	党纪政务处分人数	481
2023		496
2024		604
2025		550

如表3所示,2019年至2025年期间,“其他”类型问题的“查处问题数”“批评教育和处理人数”和“党纪政务处分人数”均呈现下降趋势。其中,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的“其他”类型问题的“查处问题数”从2019年的972件下降至2025年的663件,降幅为31.79%;“批评教育和处理人数”从1242人下降至886人,降幅为28.66%;“党纪政务处分人数”从793人下降至550人,降幅为30.64%。

上述数据反映出,2019年以来,违规配备和使用公车、楼堂馆所问题等“其他”类型的问题已经得到有效纠治,享乐主义奢靡之风问题的治理取得了明显成效,党内风气持续改善。

四、坚持问题导向、靶向纠治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

对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查处情况进行统计学意义上的量化分析,有利于我们全面系统认识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的产生、发展和变化规律,同时,也为我们坚持问题导向、探索靶向纠治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进一步加强作风建设的有效路径奠定坚实基础。实际上,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最优良的方法论传统之一,党的二十大报告也把“必须坚持问题导向”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世界观和方法论“六个必须坚持”的重要内容。可见,只有始终坚持问题导向,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有效路径。

(一)抓住问题本质

坚持问题导向、靶向纠治问题最重要的是抓住问题本质。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矛盾的观点,用来表述、说明事物及其发展过程的本质的概念是矛盾,在矛盾体系中,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处于支配地位、起决定作用。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创造性地提出问题的本质是事物的矛盾的观点:“什么叫问题?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①2015年1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第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进一步指出:“问题是事物矛盾的表现形式,我们强调增强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就是承认矛盾的普遍性、客观性,就是要善于把认识和化解矛盾作为打开工作局面的突破口。”^②因此,抓住问题的本质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矛盾的观点,抓准导致问题产生、发展、变化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找到解决问题的突破口,靶向纠治问题。

坚持问题导向、靶向纠治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最重要的就是要抓住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39页。

② 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第127、128页。

题的本质,也就是要抓准导致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产生、发展、变化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我们党制定实施中央八项规定就是为了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因此,靶向纠治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也可以理解为要抓住作风问题的本质,抓准导致作风问题产生、发展、变化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在作风问题上,起决定作用的是党性”,^①“作风问题本质上是党性问题”,^②“作风问题核心是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③“加强作风建设必须紧扣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这个关键”。^④可见,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的本质就是在党性修养、密切联系群众等根本方面出现问题,因此,抓住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的本质就是要抓准党员干部关于摆正公私关系以及处理好与人民群众的关系这个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做到公私分明、克己奉公,关心群众、热爱群众。

(二)紧盯问题的新形式

坚持问题导向、靶向纠治问题还必须紧盯问题的新形式。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变化和发展的观点,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始终处于变化发展之中,包括量变和质变两种基本状态或形式。其中,变化泛指事物发生的一切改变,属于量变的状态或形式;而发展则是事物发展变化中前进的、上升的变化,属于质变的状态或形式。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指出:“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⑤2015年1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进一步强调指出,“客观实际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过去长期困扰我们的一些矛盾不存在了,但新的矛盾不断产生,其中很多是我们没有遇到、没有处理过的”。^⑥可见,紧盯问题的新形式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变化发展的观点,充分认识问题变化发展的量变和质变的辩证关系,当质变来临时,果断地、不失时机地采取措施。

坚持问题导向、靶向纠治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必须紧盯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的新形式,也就是要时刻关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的动态演变。根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的通报口径,当前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主要呈现为“四风”问题的两大样态:其一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其二是享乐主义、奢靡之风问题。“‘四风’问题具有顽固性、反复性、变异性和传染性等特点,最容易反弹回潮、死灰复燃,也容易隐形变异、翻新升级”。^⑦可见,所谓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的新形式,其实质便是“四风”问题在当前阶段的演变与再现。因此,紧盯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的新形式就是要时刻关注“四风”问题的新动向新表现,做到科学施策、精准发力,动真碰硬、务求实效。

(三)注重从源头上防治问题

坚持问题导向、靶向纠治问题还要注重从源头上防治问题。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的观点,人的认识来源于实践,认识的目的是实践;从实践到认识,再从认识到实践,这是人的认识无限发展的辩证运动过程。1929年12月,毛泽东在为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撰写的决议案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四军党内种种不正确思想的来源,自然是由于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的;但是党的领导机关对于这些不正确的思想缺乏一致的坚决的斗争,缺乏对党员作正确路线的教育,也是使这些不正确思想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原因。”^⑧这就表明人的错误认识来源于实践中存在的问题。2015年1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进一步指出:“我们要根据时

①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习近平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5年,第17页。

②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习近平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论述摘编》,第18页。

③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习近平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论述摘编》,第37页。

④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习近平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论述摘编》,第40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96页。

⑥ 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第126页。

⑦ 孙大伟:《当前“四风”问题的新动向新表现及其治理》,《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23年第6期。

⑧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85页。

代变化和现实发展,不断深化认识,不断总结经验,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坚持理论指导和实践探索辩证统一,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良性互动。”^①可见,注重从源头上防治问题就是要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的观点,从实践中查找问题源头并根据实践的发展不断深化对问题的认识。

坚持问题导向、靶向纠治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还需要注重从源头上防治,也就是要从党的作风建设的实践中查找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产生的源头并根据实践的发展进行防治。2013年6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分析了“四风”问题的源头:“现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为什么盛行?为什么不断有人沦为腐败分子,走向犯罪的深渊?说到底,还是理想信念不坚定。我常说,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理想信念坚定,骨头就硬;没有理想信念,或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②可见,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产生的源头在于党员干部没有理想信念或理想信念不坚定,因此,注重从源头上防治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就是要针对党员干部加强理想信念教育,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做到对党忠诚、担当作为,清正廉洁、严格自律。

Significant Achievements and Effective Paths in Addressing Violations of the Spirit of the Central Eight-Point Regulation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Based on Data from December 2012 to July 2025

SUN Dawei FAN Jiajun

(Marxism Research Institut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Party has achieved remarkable results in thoroughly implementing the spirit of the Central Eight-Point Regulation. To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and systematic understanding of the investigation and handling of violations of the spirit of the Central Eight-Point Regulation, this study is based on the “Summary Tables of Investigating and Handling Violations of the Spirit of the Central Eight-Point Regulation in Various Provinces, Autonomous Regions, and Municipalities,” which are publicly released by the Central Commission for Discipline Inspection (CCDI) and the National Supervisory Commission (NSC). A long-term, coherent database spanning from December 2012 to July 2025 has been independently constructed. The study conducts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in a statistical sense, of the investigation and handling of these violations, revealing the patterns of their generation, development, and change. Building upon this analysis, it proposes adhering to a problem-oriented approach and explores effective paths targeted for rectifying violations of the spirit of the Central Eight-Point Regulation.

Key Words: the spirit of the Central Eight-Point Regulation; violations of the spirit of the Central Eight-Point Regulation; full and rigorous party self-governance

【责任编辑 陈 谦】

① 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第131页。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年,第414页。